

21th

21世纪科技广场

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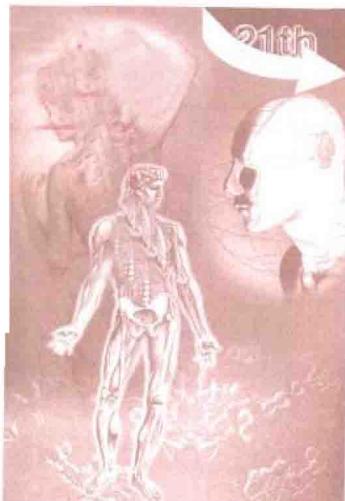
古老而年轻的科学

廖育群 曹育 李平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医学

古老而年轻的科学



廖育群 曹育 李平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医学：古老而年轻的科学/廖育群等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10

(21世纪科技广场)

ISBN 7-218-03220-6

I . ①医…②21…

II . 廖…

III . 医学-普及读物

IV . R-49

责任编辑	陈更新 周 杰
封面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 页	2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3220-6/R · 87
定 价	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廿一世纪科技广场

宋健



目 录

上篇 理性思维话医学

一 医学的特殊性质	3
二 中国传统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8
三 阴阳学说与中国传统医学	58
四 中国医学的思想性风土	71

下篇 百年巨变话医学

一 医学的今昔	109
二 日新月异的诊断技术	120
三 不断发展的治疗方法	145
四 不可忽视的预防医学	164
五 颇受关注的几种现代疾病	172
六 医学进步的源泉——基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194
七 明天的医学	203
参考书目	214

04196138

世纪科技广场

21

1

上
篇

理性思维话医学



一

医学的特殊性质

文明，是由多方面要素构成的。社会秩序的建立，物质财富的积累，认识与利用自然的能力，乃至睿智圣贤的思想、平民百姓的习俗等等，无不在文明的盛宴中各踞一席。

人的地位——对于人之生命及其基本权力的尊重程度，无疑是文明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任何一种文明来说，“人的地位如何”都是衡量其文明发达程度如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该文明“浓度”的一种显示剂。奴隶制度，无视人之生命及其权力，无疑是文明程度极低的重要指征；司法制度，是否达到了既不滥杀无辜——尊重生命，又能时时处处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样也是衡量一种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准；社会保障体系与卫生福利事业，当然也与对人的尊重程度密切相关，但又需要以经济实力、医疗水平等为基础。我们往往习惯于将一种文明划分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部分加以考察、研究与论说，在这种情况下，“医学”无疑被置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之中。但是，由于医学处处与“人的地位”——对于生命的尊重程度，以及有关生命的道德标准密切相关，因此医学的发展历程、



所要解决的问题等等，时时处处与“两大门类”——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换句话说，医学地位的上升、人们对医学的重视程度，及医学的发展，均与“人”之地位的上升有着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当人之地位不断受到重视时，都会带动医学及卫生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反之，医学的进步、医学知识的不断增长，自然也是这种文明构成的要素之一。因此，当我们思考“医学”问题时，应该对下述一些问题有所了解。

(一)

医学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

求生，然后是求生得质量好些，并不断地再好些（包括身体的健康与物质、精神环境），都是人的本能，甚至是一切有生之物的本能。植物将根伸得远些、深些，以求滋养与水分，长得高些以求阳光。细菌病毒改变自身结构，以对抗各种化学药品等等，都表现出求生与求生存质量的本能，只不过其水平远远不如万物之灵“人类”。

有人将中西两种文化比喻为两棵大树，前者是“生命之树”；后者是“知识之树”。并说：“中国哲学就是生命哲学，中国的道教就是生命宗教，中国文化就是以生命为本的文化。”这话确实有些道理，中国人自古就重视“人”，这是因为自然万物以其“德”性高低而排列有序。“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万物之灵”，位居物性阶梯的最高处，是由于人不仅像其他一切无生命、有生命之物一样具有气、知觉、情感等“德”性外，还独具“仁义”之性。因而治理万物之灵自然就是最高等与最重要的学问与工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的儒家“礼教”，其核心就





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秩序。道家学问，常常被解说成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之道。其实，“养生”的本义乃是“治生”，即与儒家礼教同样，是言说如何治理社会的学问，只不过治理的方式不同罢了。道家所讲的“养生之道”，是提倡善为政者，当如庖丁操刀解牛——顺其纹理之自然。

然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均深知这样一条最基本的道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生命的存在，自然也就谈不上生命体之间的秩序、等级、精神治理等问题。道家认为保全性命，有“外”、“内”两方面，缺一不可。一切社会活动方面的危险，为“外”；疾病的困扰与伤害，为“内”。儒家虽然不大注意个人生命的延续（义、命相较，当舍命取义、杀身成仁），但却极端重视家族的延续，孔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最重社会秩序的治理，但随着文明的发展，许多儒士亦意识到生命自身治理的重要性。欲要实现奉君养亲、传宗接代的理想，则必须知道“生命治理”的正确方法。医学，正是从这点上获得了地位逐渐上升，脱离百工贱业之伍的契机，或者说，这是中国古代医学发达较早、内容丰富的原因之一。

尽管在天地造化万物之时，就赋予了人类以至尊至上的地位，但对于个人生命的重视，尤其是对人类自身健康之重要性的认同，却是随历史之演进而逐渐达成。自先秦以来，司法制度的建立，要求“审狱讼，必端平”——生杀公正。遇疫病流行，为政养民者施医给药、省疾问病，表现出“人”之地位的逐渐提高。至宋代，在“大辟”（死刑）错则不可改——人命关天，必须审慎之司法道德观的指导下，出现了代表中世纪最高水平检验制度与方法的《洗冤集录》，是“重视生命”这样一种思想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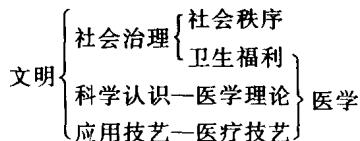
随时代之演进而愈见增强的体现，并且与检验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洗冤集录》中含有许多与近代西方法医学内容一致的知识，但在古代中国，这些知识并非源自医家，而是来自从事司法检验的官吏。当然，医学才是与“生命”关系最为密切的知识体系。宋代以后有“儒医”之说，他们不仅秉承了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人命至重，有如千金”的思想，而且将“认识生命”与“治理生命”提高到与“治人”、“治世”同等重要的地位，视医学为“吾儒格物穷理之一端”。这样就使得医学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知识分子从上疗君亲之疾（忠、孝），下救贫贱之厄（仁、德），中以保身长全的角度强调医学的实用价值，使其与从政治国居于并列的地位。这样一来，仕途中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仕途拥挤、官场失意、政治风云不测已成司空见惯之时，有人提出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口号，并在许多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这可以说是造成医学地位随时代演进而有所提高，业医者的队伍中知识分子逐渐增多，素质改善的重要社会、思想因素。原本属于百工贱业、君子不齿之流的“医学”，成为知识分子探讨造化之理、实现济世夙愿的舞台之一。

当中国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上述因素的影响力较前此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加上医药作为一种职业或行为所固有的经济价值，清代社会的医药业亦自然而然地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全国各地传延至今的许多老字号中药店大多创始于清代，北京的同仁堂是其中声名最著者。清代的著名医家、版刻医籍虽然已难枚举，但这仍不足以反映当时社会中医药状况的全貌。如果查阅一下地方志，则可看到难以胜数的乡村医家的各种著述。这些人或承家技，谋食一方；或仕途失意，弃儒从医，行善乡里；



或儒医兼修，小有名气；或仅仅是把医学当作学问加以研究，聊以消遣。他们的著作，大多是手抄家传，从未版刻面世。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这些医家的著作确实缺乏新意，价值不大，但欲综观医学在当时社会中的存在状况以及知识分子对于医学的态度时，则对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可忽视。

正是因为对生命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强，才推动了古代医学的发展，构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由于医学知识体系在总体中所占有的突出地位与较大比重，因而可以说有关这个知识体系和医学社会学方面的考察是研究中华文明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以养护万民生命为目标的仁政、医政，是医学的社会性。有关人体生理、构造、疾病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方面，构成了医学学问的科学内涵。利用与创造各种工具、手段方法来治疗疾病，是医学的技术要素。这些技术有时得益于科学认识的指导，有时与科学无关，甚至有时会来源于伪科学思维方式的启示。因而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医学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面体，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如果我们说“文明”中包括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形态、认识水平（科学）、技艺等几大方面的内容，那么医学处于什么位置呢？



另一方面，医学中的冲突与矛盾也往往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例如，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技术于 1805 年传入中国后，影响





到原有种人痘之医的生意，故大加攻击。清代沈善丰在《牛痘新编》一书中说：“牛痘尽善尽美，最有碍于塞鼻痘医；牛痘不必延医，又不利于幼科；牛痘无余毒遗患，又不利于外科；牛痘无药有喜，于药铺亦不无小损。是故每有射利之徒，视善举为妒业之端，暗中煽惑。以‘刀刺’为惊人之语，以‘再出’为阻人之词。”类似记载在同时代的其他著作中亦能见到。又如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中西医之争”问题，亦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执政期间数次欲图废止中医引发的一场中医与政府间的矛盾，这场数十年的“论争”主要是中医界为求生存、求发展而与执政者进行了多次斗争，并不是两种医学体系、两支学术队伍间的学术论争。这场论争以 1954 年 10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而告结束。卫生部门进行检查与自我批评，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至此，中医界数十年来奋力争取之事开始逐步实现，中西医论争中的社会性矛盾在大体上得到解决。在学术方面也出现了“中西医结合”的新鲜事物。

在当代中国，不管是谁患了病，都会看医生，将自己的问题，甚至是生命，交给医生去处理。但在西方社会中，这种观念已显得过时。人们患病时，自认有选择医疗、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医患关系的这种改变，可以说是 20 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进步，而且在中国，尤其是文化发达、知识水平较高的大城市中也渐有表现。这种倾向带来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医生应该能向患者讲解某一种疾病存在着多少种治疗方法或方案，各有什么好处与缺点，各种治疗方法的成功率如何，不治之症的存活率与存活时间如何，等等。然而这有时是超越了一位医生现有知识水平的，如果介绍不全面、不准确，是否应承担某种责任？医生为获得全





面的知识则必须再学习，向病人做全面介绍将延长诊疗时间，由此涉及的经济问题应如何解决？

医学的对象“人”，虽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又有种种的特殊性，使得医学永远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医生也永远无法像其他领域的科学家那样去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

(二)

最古老与最年轻的科学

疾病是生命体固有的自然现象。除人类以外，各物种只能遵循优存劣汰的自然法则，不断地淘汰掉劣弱者，在客观上起到了维系该物种自身素质水平的效果。早期人类同样遵循这一法则，无力抗争自然的选择。例如，各种传染性疾患在早期人类中的蔓延与控制，主要是受制于群体数量的变化，当每群不超过 50 人时，只有那些适于小范围社会聚落中传播的疾病才可能存在；当人群数量不断上升时，许多传染性疾患便获得了存在与蔓延的条件；而当这类疾患造成人口死亡、人群数量下降后，疾病的蔓延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控制。

然而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根本区别，恰恰在于随着自身智慧与文化进步，自然选择对人类生存、健康、体质改变的作用逐渐减弱，科技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却越来越大，最终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有益的本能行为逐渐变成生活经验被保存与传授，并可根据客观需要随意重复这些经验。这样，原始医药也就逐渐过渡到经验医学的高一层次。这种经验的积累与重复使用，又使得人类社会中逐渐分化出一种新的职业，即医生的行为。

“有人调查过 20 世纪尚存的一些原始部落，他们并无任何宗教观念，但都有一定的世代相传的卫生习俗。非洲一些部落，他



们把疾病看做是‘自然的’，对所患疾病采用世代相传的药方和疗法进行治疗，无需作出任何超自然的解释”。“民族学的调查证明，就是在巫术盛行的一些原始部落，也存在着与巫术丝毫无关的卫生习俗，拥有治疗各种疾病的丰富经验，以及并不求助于巫术的草医。……如果自己或邻人不能治，就求助于村庄内经验较多的草医，这种草医是世代相传的，懂得多种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①

上述这些解说，似乎勾勒出了早期医药的概貌，但如果作为专题研究则会引出种种弹劾。例如：一切物种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存亡，显然与基因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某种抗病基因可以使某些人天生免受某种疾病的侵害；原始部落究竟是“原始的”还是“退化的”？巫术同样是人类智慧的一种表现形式，难道与原始的医药真的毫无联系吗？然而不管这类疑问有多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医治行为、医药知识的确是一门最古老的知识。其原因正是由于疾病始终伴随着生命体，人类从一开始就需要对待与处理这类问题。疾病不像其他自然现象或灾害，无法像躲避洪水、干旱、风雨般地去躲避疾病，甚至于出生（分娩）、育儿，也需要一定的知识与经验。在中国古代，到了文化已相当发达的战国秦汉时期，许多文人、大臣往往是用身体上发生的现象、疾病的原理等等为例去解释治国治民的道理。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些文人、大臣们的讲述，与古代医学著作中所讲述的道理几乎是一致的。这一方面说明古代的医学知识——有关人体与疾病的知识，并不像今日那样专门，几乎成为

^① 邱仁宗：《医学巫源说和医学起源问题》，《中华医史》，1981年第1期，第6页。





医生独占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类知识的产生确实很早。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最古老的印度文献是赞歌式的“吠陀”，其中已然含有关于生命、疾病的许多内容。随后出现了专讲生命知识的“阿输吠陀”。据印度学者讲：“古代印度的医学，具有比今日之医学内涵远为宽广的含意。古代印度医学构成了广义之自然科学的基本核心，由这个核心逐渐派生出植物学、动物学、化学、物理学、气象学及矿物学等今日所言之各个学科。”^① 在英语中，医生与博士是一个词“doctor”，其来源是希腊语“教诲”。从中亦可看出西方社会对医学的看法。日本社会在明治维新之前，有“儒医”一词，但其含义却不像中国社会在使用“儒医”时是指“儒者（知识分子）之医”。日本的“儒医”是并列关系，即儒者与医者。简单地说，当时日本社会中最重要的学问就是儒——社会科学、治世之道、政治人伦，和医——自然科学、治身之道、造化之理。在许多古代社会中，虽然有服务于授时制历的天文学、解决计算问题的数学、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书等等，但其普及程度、涉及到的对象，绝不能与医学发达的程度与广度相比。

人们常常以近代医学的状况去绳墨类比古代医学，以为医学要待其他自然科学分支的实验性研究产生了成果后，再应用于医学领域，因而医学的发展会相对滞后。其实，古代的医学并不依赖于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的医生又往往是博学多识的大家，他们在其他自然科学分支中的知识水平，并不逊色于同时代的专家，甚至可以是几方面知识的代表人物。因此造成了古代社

^① Debiprasad Chattopadhyaya: *Science and Society in Ancient India*, Research India Publications, 1977.





会中，医学发展一般均较早的客观状况。

然而到了近代社会，情况却大不相同。医学开始脱离了经验性、哲学性的知识范畴，逐渐被纳入实证的范畴，尾随于其他自然科学分支之后。这时医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技艺方面均更多地依赖于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如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等）与技术发展。自然表现出相对的滞后状态。另一方面，近代科学各分支的发展，与对象相对简单密切相关，许多时候可以用力学的、机械的或化学的原理加以处理。但人体的确太复杂了，现有的物理、化学知识，实验水平往往解决不了医学中遇到的问题。20世纪的科学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面对人体这部复杂的“机器”，仍然时常不知其所以然。

我们在本书的后面介绍了一些近代医学及其在当代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这些成就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它使我们对人体这部复杂的机器有了更多更深更具体的了解，具备了许多发现其“故障”并加以解决的新办法。沿着这条道路继续不断地探索，将会获得更多战胜疾病痛苦的手段。同时，在“中国医学的思想性风土”中，我们又介绍了国外学者对各种医学体系发展历史的思考，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的价值及如何在当代医学中找到自己应有位置的看法。医学，这门最古老但又最年轻的科学，将会如何发展，应该如何发展，确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

(三)

传统医学的复兴

在世界各地，以不同语言刊印古代的“科学经典”乃是常见之事。而且刊印的形式有多种多样，或以历史旧貌印行，或进行现代语译并加注释；或节选精要，或一字不删；有时还会请专家